

中非能源合作理念模式与话语权博弈

——以肯尼亚、乌干达和埃塞俄比亚为例

翁冰莹 吴岑

内容提要 在全球地缘格局发生深刻变革以及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双重推动下，能源合作正逐步上升为国际政治经济博弈的核心领域。非洲凭借其丰富的资源禀赋，正逐步成为大国开展能源外交的重要战略空间。本文对中非能源合作的机制演变与理念变化进行回顾，并以中国与肯尼亚、乌干达、埃塞俄比亚三国的合作实践为切入点，深入分析其多元化实践模式。研究显示，随着中非合作论坛机制不断成熟以及“一带一路”倡议持续推进，中非能源合作已逐步突破早期单一的援助型框架，转向以基础设施建设带动能源开发、传统能源全产业链协同开发及清洁能源绿色创新为主的多元化发展模式。这一转型过程不仅体现了“真实亲诚”政策理念与可持续发展理念，更在实践层面推动形成以全球南方国家协同发展、平等互惠为核心特征的新型合作模式。尽管面临复杂的外部挑战，中非双方仍通过探索新型发展路径，共同推动非洲能源结构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转型。这种以绿色创新为特色、以互信互鉴为基础的南南合作实践，不仅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与能源安全挑战提供了现实路径，也为完善全球能源治理体系提供了具有现实意义的创新范例，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关键词 中非能源合作 能源外交 全球治理 南南合作

作者简介 翁冰莹，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深圳518060）；吴岑，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深圳518060）。

能源不仅是国家经济自主与战略安全的基石，更日益成为重塑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重要变量。随着全球能源体系加速向绿色低碳转型，可再生能源与清洁替代技术正逐步重构世界能源版图，这一结构性变革也在深刻影响非洲现代化进程。然而，作为全球重要的能源储备地区，非洲长期陷于资源富集与价值低谷并存的结构性困境之中。国际能源署《2025 年世界能源投资报告》显示，2025 年全球清洁能源投资规模达 2.2 万亿美元，但非洲在其中的占比仅为 2%。^① 这种资源潜力与实际开发能力之间的严重错位，根源于当地资金匮乏、基础设施薄弱及技术滞后等多重因素，这不仅限制了资源向经济价值有效转化，也制约了非洲工业化进程与民生改善。在此背景下，中非能源合作的战略价值日益凸显，并且逐步超越传统的资源互补逻辑，成为助力非洲突破能源发展瓶颈、深度融入全球能源转型浪潮的重要路径之一。

从坦赞铁路时期的南南互助到“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深度协同，中非合作的历史演进映射出双方从政治声援向发展共行的跨越。这一长期互动不仅为非洲本土能源建设注入内生动力，也对西方主导的资源治理模式形成重要补充与修正。本文旨在系统梳理中非能源合作的机制演进及其核心驱动要素，并以中国与肯尼亚、乌干达、埃塞俄比亚东非三国的合作实践为案例，提炼其中呈现的多元化实践范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在国际话语博弈加剧的背景下，中非双方如何应对外部挑战以深化合作，并从“全球南方”的视角出发，总结相关制度性与实践性经验，既为参与全球能源治理提供中国视角，也为全面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提供学理参考。

中非能源合作的机制演进与理念变迁

能源素来是国际政治博弈的战略枢纽。资源稀缺性叠加地缘冲突，使

① World Energy Investment 2025,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2025, p. 9, 12, <https://iea.blob.core.windows.net/assets/1c136349-1c31-4201-9ed7-1a7d532e4306/WorldEnergyInvestment2025.pdf>, accessed July 17, 2025.

把控全球能源重心、保障能源安全逐渐成为大国竞逐的重要议题。在此背景下，非洲凭借其丰富的资源禀赋与日益凸显的地缘战略价值，成为各方竞相合作的重要区域。为深入解析中非能源合作的复杂图景，本文拟回溯双方合作的政策背景、机制演进与理念变迁，以厘清其历史脉络与内在逻辑。

（一）中非能源合作的机制演进

中非能源合作历程并非线性演进，而是在不断调整中逐步深化。第一阶段（1955—2000）是政治驱动下的援助与经贸起步。这一阶段具有鲜明的政治先行特征，并在后期逐步向以经贸为导向的务实合作转型。1955年万隆会议提出的“求同存异”方针为中非合作奠定思想基础，随后在1966年至1978年的建交高潮中，中国主要采取无偿援助方式支持非洲民族解放运动与基础设施建设，坦赞铁路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项目。这种不附带政治条件的援助为中国赢得广泛信任，直接助力中国于1971年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也为日后的能源合作奠定了政治互信基础。改革开放后，中非合作开始从单纯的政治援助向互利共赢的经贸合作转型。1992年，中国首次从非洲进口原油，标志着双方实质性能源合作的开端。^① 总体而言，20世纪90年代对非能源合作主要依托现汇贸易与投资开发两条路径，即通过贸易直接进口原油，并尝试参与当地油气勘探以获取稳定的份额油，虽规模有限，但已开启中非能源合作从输血到造血转变的初步探索。

第二阶段（2000—2013）是论坛机制化与全产业链深化。以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为分水岭，从此中非能源合作进入机制化、规模化的新阶段。在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引领下，双方合作实现从单一贸易向

^① 查道炯：《中国在非洲的石油利益：国际政治课题》，《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4期，第54页。

“资源—基建—产业”深度融合的跨越，呈现出全产业链特征。具体而言，中国不仅扩大对非油气贸易，更深度参与苏丹、乍得、尼日尔等国的一体化石油工业体系建设。以中国石油企业为代表的建设力量，利用上中下游一体化优势，在 20 多个非洲国家运营近 60 个项目，向东道国输出技术、资金与管理经验，有效提升了非洲本土的资源开发能力。^① 同期数据佐证了这一时期的合作效果：中非贸易额从 2000 年的 106 亿美元增至 2013 年的 2102 亿美元；在电力建设领域，2010—2015 年中企承建的发电装机容量占撒哈拉以南非洲新增总量的 30%。^② 这一阶段合作既保障了中国的外部能源供应，也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推动非洲工业化进程，逐步形成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的合作格局。

第三阶段（2013 年至今）是“一带一路”框架下的绿色转型与高质量发展。这一阶段以“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为开端，中非能源合作呈现出系统化、制度化与绿色化的新特征，核心逻辑从单纯的资源开发转向全产业链布局与清洁能源共建。在制度设计上，2015 年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将中非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确立五大支柱；2018 年北京峰会期间中国与非盟签署《关于加强能源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将能源合作纳入“设施联通行动”；2021 年达喀尔会议通过行动计划，明确在“中国—非盟能源伙伴关系”框架下重点解决非洲能源可及性与电气化问题。在实践路径上，这一时期表现为双重维度的深化：一是全产业链的系统性覆盖，自 2014 年丝路基金成立以来，中国在非洲能源开发实现从投融资支持到项目建设、从传统油气勘探到终端电力消费、从硬件施工到技术

① 《中非能源合作提质升级正当其时》，中国石油新闻中心，2025 年 6 月 19 日，<https://news.cnpc.com.cn/system/2025/06/19/030166086.shtml>，访问日期：2025 年 7 月 20 日。

② 《中企深度介入撒哈拉以南非洲电力基础设施建设》，新华社，2016 年 7 月 20 日，<https://www.imsilkroad.com/news/p/3803.html>，访问日期：2025 年 7 月 20 日。

规划与运营管理的纵深延展;^① 二是绿色丝绸之路实现了实质性建设, 中国通过光伏产品出口与技术转移, 大力支持非洲可再生能源发展。2024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中国—非洲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发展报告》显示, 自 2015 年以来中非在绿色低碳领域已实施上百个清洁能源项目, 成为南南合作中技术转移与绿色转型的典型范式。^②

2024 年以来是迈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战略共生阶段。2024 年 9 月,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功举行, 标志着中非能源合作迈向战略共生的新高度。习近平主席宣布, 将中国同所有非洲建交国的双边关系提升到战略关系层面, 将中非关系整体定位提升至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 并强调中非共逐现代化之梦, 必将掀起全球南方的现代化热潮。^③ 这一全新的战略定位为中非能源合作带来更深层的政治互信与更有力的机制保障, 标志着双方合作逻辑在既有基础上进一步升维: 即在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的指引下, 能源合作不再仅仅是经济互补的手段, 更成为连接非洲工业化需求与全球绿色转型目标的关键纽带。在这一时代语境下, 中非能源合作机制日趋成熟, 正朝着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方向加速推进。

(二) 核心理念的变迁逻辑

中非能源合作之所以能实现从早期单一的政治援助向“一带一路”框架下全方位战略合作转变, 其根源在于内在驱动理念的持续迭代与层级

① 杨永明:《“一带一路”能源国际合作报告(2023)》, 2023 年 9 月 22 日, https://www.cpn.cn/news/baogao2023/202309/t20230922_1637305.html, 访问日期: 2025 年 7 月 25 日。

② 《中国—非洲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发展报告》,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https://www.yidaiyilu.gov.cn/a/icmp/2023/12/15/20231215179983118/bcb251af3c01496eb5f1cf47c7557171.pdf>, 访问日期: 2025 年 7 月 25 日。

③ 《习近平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外交部, 2024 年 9 月 5 日, https://www.mfa.gov.cn/zyxw/202409/t20240905_11485720.shtml, 访问日期: 2025 年 7 月 25 日。

提升。这一演变历程并非简单的政策叠加，而是中国外交思想与中非现实需求在互动中不断嵌合的结果。

在中非能源合作的起步阶段，其核心理念经历了由道义优先的国际主义逻辑向平等互利的务实逻辑转变。前期在世界殖民体系瓦解与亚非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时代背景下，非洲国家急需打破依附体系，中国则致力于突破外部封锁。基于此，彼时的合作具有鲜明的政治主导色彩，中国强调雪中送炭的患难情谊，主要通过无偿援助支持非洲政治独立，体现反帝反殖的国际主义精神。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与全球化浪潮兴起，中非双方的供需结构发生变化：中国经济腾飞催生出巨大的能源需求，而非洲渴望将资源禀赋转化为工业化动力。这种互补性在客观上推动了合作理念向经济性回归。1983 年中国政府提出“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四项原则，标志着对非合作从单向援助转向双向赋能。这一时期的理念核心在于以市场化机制为媒介，通过互补性贸易与投资，初步实现双方资源与市场的有效配置。

进入 21 世纪，中非能源合作理念进一步转变为以互利共赢与共同发展为核心，并逐步确立以发展为导向的战略思维。这一转变依托于中非合作论坛的机制化平台，推动双边关系实现从新型伙伴关系到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跃升，促使能源合作从零散的双边往来迈向多边机制化协作。更为关键的转折点在于习近平主席提出“真实亲诚”对非政策理念与正确义利观。这为新时代合作提供了重要的价值指引，强调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主张在合作中不附带政治条件，既追求实效，更讲求道义。^① 在此指引下，中非能源合作形成了以基础设施建设带动产业升级、以能源开发促进东道国自主发展的内生型合作模式。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与深化，绿色发展的制度化与系统化成为这一阶段的理念核心。面对全球气候变化与能源转型的时代挑战，中非

^① 张曼、金正：《在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之路上携手同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2023 年 3 月 29 日，https://www.gov.cn/xinwen/2023-03/29/content_5749019.htm，访问日期：2025 年 7 月 28 日。

合作的主轴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2016年习近平主席提出携手打造绿色丝绸之路，标志着生态环保成为中非合作的核心议题。随后，《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2017）与《关于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意见》（2022）等政策文件出台，构建了从理念倡议到路线图落实的完整政策体系。这一阶段的理念演变表明，中非能源合作正在超越传统的化石能源开发路径，转向以绿色基建、清洁能源技术转移为核心的高质量发展范式，旨在通过构建生态环保合作体系，推动双方实现可持续共生。

2024年以来，在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战略定位下，中非能源合作理念达到共逐现代化的新高度。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提出的六大现代化主张，特别是生态友好的现代化，以及《北京宣言》中关于绿色能源合作的规划，赋予能源合作新的时代内涵。在这一全新的战略语境下，中非能源合作不再局限于具体的项目投资，而是被视为全球南方探索自主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支撑。这标志着合作理念在既有基础上进一步超越传统的资源互补，逐步迈向技术创新共享、发展能力共建、绿色文明共创的深度融合阶段。

中国与东非三国能源合作模式类型

随着中非合作论坛与“一带一路”倡议的纵深推进，中非能源合作已构建起涵盖贸易、投资与承包的立体化体系，并呈现出从传统资源进口向全产业链布局与绿色技术输出转型的动态特征。^① 为理解这一复杂图景，

① 本文中能源合作三种形式采用以下定义，能源贸易往来：能源材料及产品（如石油、天然气、电力、可再生能源等）的跨境贸易、营销与销售等经济活动；跨境投资：投资者于其所属国之外的国家或地区，直接或间接持有或掌控与能源部门经济活动相关的各类资产（涵盖有形与无形资产、股权、债权、合同权利等），旨在获取能源相关利益或控制权的行为。工程承包：承包商依据合同为能源项目提供包含设计、建设、技术服务、运营维护等全流程或阶段性服务的经济活动。

本文选取肯尼亚、乌干达和埃塞俄比亚这三个战略地位突出、合作基础深厚且具区域辐射力的东非国家作为案例。鉴于三国在资源禀赋与发展诉求上的异质性，本文引入多维分析框架，将其合作实践凝练为三种理想类型：一是强调基础设施与能源开发双向赋能的基建驱动能源建设型；二是侧重化石能源上中下游系统性嵌入的传统能源全产业链型；三是聚焦可再生能源技术转移与低碳转型的清洁能源绿色创新型。这一类型化分析不仅清晰呈现了中非能源合作的多样性图景，也为后续探讨其合作机制与深层逻辑奠定经验基础。

（一）基建驱动能源建设型：以肯尼亚为例

中国与肯尼亚能源合作呈现出基建与能源协同演进特征，即以关键基础设施建设为先导，通过降低物流成本与激发工业需求，为能源项目创造市场空间，从而实现基础设施与能源系统之间双向赋能。

首先，该模式遵循“交通先行—需求激发—能源响应”的运作逻辑。作为肯尼亚独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基建项目，蒙内铁路不仅重塑了东非交通格局，也成为激活区域能源潜力的重要变量。数据显示，蒙内铁路运营 7 年来累计发送货物 3286.7 万吨，显著提升了物流效率并降低了重型能源设备的运输成本，直接解决了大型光伏组件与地热钻探设备的内陆运输难题。^① 更为关键的是，铁路沿线的工业化外溢效应显著提升了电力需求，为加里萨光伏电站、奥卡瑞地热田及图尔卡纳湖风电项目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市场预期与投资吸引力。对此，肯尼亚总统威廉·鲁托（William Ruto）指出，中国在基础设施与绿色技术领域的双重优势，正是释放肯尼亚可再生能源潜力的关键推力。^② 这种以交通基建破除能源物资运输瓶颈、以工

① 《2024 年度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5 年 3 月，<https://www.ccccltd.cn/tzzgx/ggth/ag/202503/P020250328010609201095.pdf>，访问日期：2025 年 8 月 15 日。

② 黄炜鑫：《“共建‘一带一路’的 10 年是成功的 10 年”——访肯尼亚总统鲁托》，《人民日报》2023 年 10 月 17 日，第 3 版。

业化预期引导能源投资的模式，有效助力肯尼亚实现“2030 远景规划”中的电力普及目标。

其次，该模式逐步形成以硬联通支撑与软实力内化相结合的闭环反馈机制。一方面，能源项目对基建体系实施反哺赋能。斯瓦克大坝、加里萨光伏电站等项目投运，为工业园区、港口机械及铁路信号系统提供了稳定的清洁电力保障，实现从基建驱动能源到能源提升基建效能的良性循环。另一方面，高度重视技术转移与能力建设。蒙内铁路与配套能源项目的实施采取工程建设与人力资本培育同步的策略，累计创造超 7.4 万个就业岗位，并培养近 3000 名本土专业技术人才。^① 这种将外部资本投入转化为本土内生能力的路径，不仅有助于基础设施的可持续运营，也为肯尼亚构建相对自主可控的现代能源体系奠定技术与人才基础。

（二）传统能源全产业链型：以乌干达为例

与侧重单点开发或贸易互通的合作模式不同，中国与乌干达能源合作展现出传统能源全产业链型特征。该模式的核心逻辑在于纵向一体化，即通过系统性介入油气资源的勘探、开采、炼化及储运环节，构建起“资源变现—产业配套—生态兼容”的工业闭环，从而助力东道国实现从资源禀赋向发展动能的转化。

首先，该模式在乌干达实践中体现为技术适配与产业链延伸的双重突破。作为乌干达首个商业石油项目，阿尔伯特湖油田开发不仅涵盖 2 座中心处理厂与 35 座井场的上游建设，更体现在中方对核心技术进行生态化定制与本土化适配。针对阿尔伯特湖区敏感的生态环境，中海油在翠鸟油田（Kingfisher Oilfield）引入中国自主研发的“璇玑”旋转导向系统与 8000 米静音型自动化钻机，成功将作业噪声从常规的 70 分贝降至 45 分贝

① 李卓群、蔡容涵、胡平超：《惠民之路、繁荣之路——蒙内铁路运营七周年》，中国一带一路网，2024 年 6 月 21 日，<https://www.yidaiyilu.gov.cn/p/03IJF1JB.html>，访问日期：2025 年 8 月 15 日。

以下，确立了在生态脆弱区进行高强度能源开发的环保标杆。^① 在中下游环节，合作重点突破了内陆国家的物流桎梏，规划建设全长 1443 公里的东非原油管道，打通连接乌干达油田与坦桑尼亚港口的战略通道。^② 这种“采—运—销”的全链条布局，有助于乌干达缓解有油无路的内陆困境，推动其由资源发现国向石油出口国转变，并通过产教融合方式建立油气行业人才储备，为当地创造就业岗位，从而促进能源开发与本地工业化能力的同步提升。

其次，这一模式实质上是中国在非洲成熟能源合作范式的延伸与升级。历史地看，中国在传统能源领域往往采取全产业链构建路径，即在保障自身能源供应安全的同时，协助非洲国家建立独立的现代石油工业体系，这一范式最早在苏丹取得成功。中石油曾通过大尼罗河石油作业有限公司（GNPOC）开发穆格莱德盆地，助推苏丹建成年产千万吨级的完整石油工业体系，使其彻底摆脱进口依赖。^③ 乌干达案例正是这一成熟模式在东非地区的延续。这种深度嵌入的合作方式，使非洲成为中国的第二大石油进口来源地，年进口量稳定在 6000 万吨以上。^④ 综上所述，以乌干达为代表的全产业链型合作，既体现了中国资本与技术优势的系统性输出，也为非洲国家提升能源自主性与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提供战略选择。

（三）清洁能源绿色创新型：以埃塞俄比亚为例

与前述模式不同，中国与埃塞俄比亚能源合作呈现出以清洁能源与绿色创新为核心的特征。该模式超越单纯的产能输出，旨在通过全套标准输出

① 金正、聂祖国：《中企为乌干达打造“绿色油田”》，中国一带一路网，2024 年 6 月 11 日，<https://www.yidaiyilu.gov.cn/p/0PENBFHB.html>，访问日期：2025 年 9 月 10 日。

② 韩飏：《中国海油助力乌干达首个油田建设》，中国青年报，2022 年 2 月 3 日，https://news.cyol.com/gb/articles/2022-02/03/content_m709MtVL5.html，访问日期：2025 年 9 月 15 日。

③ 《中国石油在苏丹》，中国石油网，https://www.cnpc.com.cn/cnpc/Sudan/country_index.shtml，访问日期：2025 年 10 月 17 日。

④ 李智彪：《中非能源合作热的冷思考》，《西亚非洲》2014 年第 6 期，第 110—126 页。

与高端技术转移的双轮驱动，逐步构建物质基础设施、技术规范体系与内生能力机制共同支撑的绿色能源空间。

首先，该模式在埃塞俄比亚实践中表现为中国技术标准与多元绿色供给的深度嵌入。这一体系由三大标志性项目构筑：吉布—3（Gibe III）水电站作为非洲最大的水电工程之一，总装机达 187 万千瓦，全流程遵循国际高标准，是埃塞俄比亚国家电网的稳压器；^① 阿达玛风电项目则具有重要示范意义，它不仅是中国在境外规模最大的风电总承包项目之一，也是中国风电技术、标准、设备与管理成套输出的首次实践，并推动中国技术规范转化为埃塞俄比亚国家标准；^② 莱比垃圾发电厂则聚焦城市生态治理创新，作为非洲首座垃圾发电厂，其 50 兆瓦的装机容量不仅缓解了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垃圾围城困境，更开创了固废处理与能源供给协同治理的新范式。^③ 这三大项目共同构成埃塞俄比亚清洁能源体系的重要物质支撑，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对单一能源的依赖，并提升了国家能源供给的韧性与自主性。

其次，该模式高度重视技术知识转移与内生能力培育，通过软硬结合激活本土发展的内在动力。在提供硬件设施的同时，中方通过现场指导与专门培训，系统性地向埃塞俄比亚转移电站运营与维护技术，填补当地在风电与垃圾发电领域的技术空白。这种工程建设与技术赋能同步推进的策略，不仅有助于埃塞俄比亚培育本土化的能源管理与技术团队，也通过多边机制与政策协调，优化当地的清洁能源制度环境。从单纯的项目交付转向技术标准的本土化落地，这种合作模式从资源、技术、人才及机制四个维度提升了埃塞俄比亚的能源自主建设能力。

① 徐洪峰、王晶、庞嘉宁：《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埃塞俄比亚的可再生能源合作及投融资》，2019 年 8 月 6 日，<https://iigf.cufe.edu.cn/info/1012/1256.htm>，访问日期：2025 年 9 月 23 日。
② 金亚勤：《我国承建非洲最大水电站全面投产》，《中国能源报》2016 年 9 月 19 日，第 11 版。
③ 李志伟：《非洲首座垃圾发电厂运营在即》，《人民日报》2017 年 6 月 19 日，第 22 版。

此外，这一绿色创新型合作模式具有较强的技术延展性，其在北非的实践进一步验证了中国在高端可再生能源领域的辐射效应。以摩洛哥努奥光热电站为例，该项目由中国电建与中国能建参与建设，体现了全球光热发电技术的领先水平。工程创造了多项世界纪录，包括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塔式光热电站、首个采用电涡流调频质量减振器的吸热塔及最大反射面积的定日镜系统。通过熔盐储热等前沿技术，该电站每年输送 5.3 亿千瓦时清洁电力，满足百万户家庭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摩洛哥对电力进口的依赖局面。^①从埃塞俄比亚的标准输出到摩洛哥的高精尖技术应用，这一系列实践表明，中非清洁能源合作正由基础设施建设逐步迈向技术引领的新阶段，并在推动非洲能源结构绿色转型与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中国与肯尼亚、乌干达、埃塞俄比亚的能源合作呈现出鲜明的模式多元化与路径差异化特征，其根源在于对东道国资源禀赋与发展诉求的精准对接。具体而言，肯尼亚受限于电力消费瓶颈与物流成本，确立了基础设施与能源开发协同互促的互动模式；乌干达依托即将开发的石油储量，致力于传统能源全产业链，旨在实现从资源国向工业国的跨越；埃塞俄比亚则凭借充沛的水风资源，聚焦大型清洁能源基地建设与中国技术标准的成套引进，旨在打造东非绿色能源枢纽。尽管路径各异，但三者均遵循因地制宜的合作逻辑。在此过程中，中国超越单纯的工程交付，将能力建设嵌入合作全周期，通过政府与市场的双重协作，在资金支持、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及机制构建等方面提供系统性支撑。这种全方位的赋能模式，不仅有助于东非国家构建更具韧性的现代能源体系，也为中非能源合作由输血向造血转型提供可观察的实践经验。

① 《中国能建：双向奔赴 打造摩洛哥“绿色增长引擎”》，中国能建，2024 年 10 月 25 日，http://www.cpecc.ceec.net.cn/art/2024/10/25/art_29039_2520138.html，访问日期：2025 年 10 月 5 日。

必须指出的是,本文提炼的三种合作模式本质上是基于主导特征的理想类型划分。在复杂的实践中,这些模式的边界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呈现出交叉融合与动态演进的特征。一方面,不同模式间存在功能重叠,例如大型基建项目往往兼具产业链延伸与绿色转型的双重属性,东道国出于多元化能源安全考量,也可能同时通过多种模式组合来优化能源结构。另一方面,这三种模式隐含从基础构建向深度整合的纵向演进逻辑:基建驱动型往往是合作的起步阶段,通过打破交通与物流瓶颈创造能源需求;当基础设施完善后,合作便根据资源禀赋分化为传统能源全产业链型或清洁能源绿色创新型,进入深化阶段;展望未来,随着全球碳中和进程加速,中非能源合作必将向绿色全产业链的高级形态演进,即在传统能源开发中植入低碳技术,在清洁能源开发中延伸制造环节,最终形成绿色低碳、技术密集、系统集成可持续产业合作新范式。

中非能源合作的全球效应与多维评价

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资源高度富集的大陆,中非能源合作已超越双边范畴,逐步成为影响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与能源治理体系演变的重要变量。这一合作进程在推动全球能源版图重构的同时,也处于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与话语权博弈之中。鉴于此,深入剖析中非能源合作产生的全球外溢效应,厘清国际社会多元且异质的评议逻辑,有助于中国在未来合作中更为精准地研判外部风险,并优化国际话语叙事。

(一) 中非能源合作的全球影响

中国与非洲国家拥有相似的民族国家建构史与独立发展诉求,更共享着迈向21世纪全球化进程的战略愿景。这种深层的结构性共鸣,使中非能源合作逐渐超越双边经贸往来的范畴,成为影响全球能源治理体系演进与地缘政治格局调整的重要力量。

首先，在地缘政治维度，中非能源合作通过强化全球南方之间的战略协作，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非洲在世界多极化格局中的战略权重。长期以来，非洲在全球地缘版图中处于被边缘化的外围地带，其资源禀赋未能转化为实质性的战略影响力。而中非能源合作深化，通过推动自主工业体系与能源体系的建设，帮助非洲国家逐步增强从资源开采到终端产出的全产业链参与能力，其实质是回收经济主权与重塑战略底气。这种平等互利的新型合作模式，客观上削弱了传统宗主国对非洲的垂直控制体系。更深远的影响在于，中非合作在客观上发挥了战略催化效应，促使印度、土耳其、日本及欧洲诸国重新审视非洲的战略价值，并相应加大对非投入。这种多元竞逐格局，在一定程度上推动非洲由大国博弈的被动客体向具有议价能力的战略主体转变，从而推升其在地缘政治中的整体地位。

其次，在经济与技术维度，合作通过基础设施与产业资本的双重嵌入，推动非洲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攀升。中非能源合作不仅体现为资源流动，也表现为发展动能的跨区域转移。中国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改善非洲的交通、电力与通信底座，并不仅限于硬件输出，更注重技术转移与人力资本培育。这种“基建+产业+技术”的复合模式，有效推动非洲农业、工业及数字化领域的产业升级，并增强其内生发展能力。以关键矿产领域为例，中国企业投资、技术及管理经验的注入，提升了相关非洲国家在新能源汽车与高端制造全球供应链中的参与度和附加值获取能力。这一进程不仅激发了非洲经济活力，更通过优化全球供应链布局，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新的市场空间。

最后，在治理范式维度，中非能源合作探索并推动形成了以发展为导向的南南合作路径，对西方主导的传统治理体系构成建设性修正。中非能源合作最富创新性的贡献是挑战并超越了西方长期主导的“中心—边缘”依附模式。相较于西方附加政治条件的援助逻辑，中非合作开创了以平等互惠、绿色创新与发展实效为主导的南南合作新范式，其实践特征在于去政治化与重民生化，中国企业在资源开发的同时大力投入配套基建，不搞说教式改造，而是专注于提升伙伴国的自主发展能力。这一合作实践向全

球南方传递了强有力的信号，即现代化道路并非只有西方普世主义这一种选项，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国家主导与务实的国际合作，实现独立自主的经济起飞。这种基于本土实践的合作经验，为全球能源治理体系改革贡献了中国方案，即治理核心应当回到发展公平性与包容性。

（二）国际话语的分化与博弈

中非能源合作不仅构成地缘经济的实践场域，也逐渐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与话语权争夺的重要议题。历史上，以法国为代表的传统宗主国始终将非洲视为其地缘政治的势力范围，试图维持对非洲的影响力。时至今日，无论是埃尼、道达尔、壳牌等传统能源巨头，还是欧盟的“全球门户”计划，均显示出传统大国在非洲能源领域的持续关注与争夺。在此背景下，中非能源合作快速发展不可避免地被置于国际媒体与智库的显微镜下。其中，部分法国智库常基于自身地缘利益考量与西方中心主义视角，对中非合作持有审慎甚至批判性的立场，并构建了一套包含“新殖民主义”“不透明运作”及“环境掠夺”等要素的负面叙事框架。对此，有必要对相关核心论调进行学理剖析与事实回应。

首先是对“新殖民主义论”的解构与回应。该论调倾向于将中非合作类比为旧有的殖民掠夺，认为中国在非洲投资呈现出资源富集国集中特征，核心目的仅在于通过不对称依赖获取原材料以满足国内需求。例如，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曾发布报告，指责中非命运共同体叙事旨在掩盖中国的扩张主义野心。^①然而，这种观点存在严重的认知偏差与历史错位。它忽视了中非合作中基础设施建设换资源模式的发展属性，即中国通过能源投资帮助非洲实现基建升级、技术转移与产业配套，这与西方殖民时期的

① Jean - Pierre Cabestan, Elisa Domingues Dos Santos, Zhao Alexandre Huang Philippe Le Billon and Thierry Vircoulon, « Les influences chinoises en Afrique. 1. Les outils politiques et diplomatiques du “grand pays en développement”, » *Etudes de l' IFRI*, le 17 novembre, 2021, <https://www.ifri.org/fr/etudes/les-influences-chinoises-en-afrique-1-les-outils-politiques-et-diplomatiques-du-grand-pays>, accessed October 17, 2025.

单向掠夺有着本质区别。事实上，中国已成为非洲可再生能源项目最大的投资国，这表明合作逻辑已从单纯的资源获取转向助推非洲能源结构的绿色转型。这种由援助依赖向自主发展取向的转变，在逻辑上削弱了“新殖民主义”指控的解释力。

其次是对“不透明论”的澄清与制度性解释。西方舆论常诟病中非能源项目在融资举措与运作机制上缺乏透明度，不符合西方的善治标准。^① 实质上，这反映了两种治理哲学的冲突：西方强调程序正义与公开化，而中国模式更侧重于绩效合法性与双边协商。所谓的“不透明”指控，往往忽视了中非之间已建立的常态化政府间协作机制。在安哥拉等国以本格拉铁路建设为代表的实践证明，尽管部分商业合同细节遵循保密条款，但项目本身为内陆国家提供了关键出海通道，极大降低了出口成本。^② 这种以实效帮助非洲国家突破发展瓶颈、尊重东道国自主意愿的“务实主义透明”，是行之有效的另一种治理范式。

再次是对“破坏环境论”的辩证分析。部分西方观点批评中国金融机构资助被西方以环境风险为由拒绝的项目，认为这损害了非洲的自然资源利益。^③ 该论调虽然指出生态风险的客观存在，却选择性忽视中非合作在绿色技术赋能方面的动态演进。中国并未简单降低环境标准，而是主张建立符合发展中国家阶段性特征的环境评估体系，反对以环保为名行“绿色壁垒”之实。随着《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25—2027）》推进落实，中非合作已逐步建立起以清洁能源为主导、全流程环保管控为支

① Question de développement, synthèse des études et recherches de l'AFD: «Le verdissement des investissements énergétiques de la Chine en Afrique: enjeux et défis», le 19 juillet, 2022, <https://www.afd.fr/fr/ressources/le-verdissement-des-investissements-energetiques-de-la-chine-en-afrique>, accessed 17 July, 2025.

② 宋词：《中企承建本格拉铁路首次在非洲实现铁路连通两大洋》，新华社，2019 年 7 月 31 日，<http://ysp.net.sasac.gov.cn/n2588025/n2588139/c11868278/content.html>，访问日期：2025 年 10 月 9 日。

③ 张猛猛、吴绍忠、杨晖：《法国智库对中国参与非洲建设的认知嬗变》，《外语学刊》2024 年第 6 期，第 102—109 页；Ruth Gordon, “The Environmental Implications of China's Engagement with Sub-Saharan Africa,” December, 2012, <https://digitalcommons.law.villanova.edu/wps/art175>, accessed September 16, 2025.

撑的绿色创新范式。非方代表关于愿同中方探索可持续能源合作方式的表态，表明非洲国家在发展权与环境权平衡中的自主选择。

最后是对三方合作前景的理性反思。值得注意的是，西方舆论并非铁板一块，其内部也涌现出理性反思的声音。法国学者克洛德·麦耶（Claude Meyer）与弗朗索瓦兹·尼古拉（François Nicolas）均指出，中非合作具有务实性与互利性，中国的目标主要在于经济可持续发展而非政治霸权。^① 这种客观认知的回归，为中西方对非关系从“零和博弈”走向“正和博弈”提供了可能性。近年来，以中国电建与法国道达尔、法国电力在加蓬开展的多方能源合作为标志，第三方市场合作正成为新趋势。这种模式将中国的工程优势、法国的技术经验与非洲的资源禀赋加以整合，不仅有助于缓解大国在非洲的竞争，也为全球南方合作提供多边共赢的优质样本。

综上所述，围绕中非能源合作的话语权博弈，本质上是旧有国际秩序与新兴合作范式碰撞的缩影。西方的焦虑源于其规范主导权削弱流失，而非洲的积极回应更多源于对平等发展权的现实关切。未来的关键在于推动更具建设性的对话，为此中非双方有必要提升话语叙事能力，并通过具体合作实效修正国际社会中的刻板认知；同时积极探索“中非 + 第三方”合作模式，将竞争转化为互补性协作，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演进。

中非能源合作的挑战与发展路径

基于平等互利原则，中非能源合作持续向纵深推进，这不仅为非洲能

① 李洪峰：《法国国际关系智库的中国研究：视角与立场》，《社会科学文摘》2018年第8期，第117—118页；Françoise Nicolas, “China’s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European Union: Challenges and Policy Responses,” *China Economic Journal*, February 19, 2024, <https://www.ifri.org/en/external-articles/chinas-direct-investment-european-union-challenges-and-policy-responses>, accessed July 17, 2025.

源转型与工业化提供重要动能，也为中国保障能源安全与拓展国际合作空间提供战略支撑。然而，合作深化往往伴随着风险累积。当前，非洲内部的政治生态变迁与经济债务压力，叠加外部的地缘政治博弈与话语权竞争，使中非能源合作进入机遇与挑战并存、存量博弈与增量拓展交织的复杂阶段。

（一）挑战与风险：多维视角的审视

第一，政治稳定性不足与资源民族主义回潮构成重要的结构性风险。非洲部分地区长期处于政治动荡与治理转型的阵痛期，政权更迭往往导致法律与契约的延续性中断。以尼日尔为例，尽管中石油公司在尼日尔长期深耕，助力该国建立完整的石油工业体系，但 2024 年深陷债务危机的尼日尔军政府在签署获贷备忘录仅一年后，便出现政策急转。2025 年军政府领导人奇亚尼（Abdourahamane Tiani）签署紧急政令，驱逐中方高管并查封炼油厂账户，同时以“歧视性经营”为由吊销中资酒店执照。^①这一事件揭示了脆弱型国家营商环境的极大不确定性，当东道国面临财政危机或政权更迭时，可能诉诸激进的资源民族主义手段，通过撕毁协议、没收资产或勒令停产来转移国内矛盾，这种现象凸显了中非能源合作在制度化保障方面仍有不足。

第二，债务可持续性压力引发的融资与发展悖论。随着基础设施贷款规模扩大，部分非洲国家的偿债能力逼近极限，导致合作面临债务违约风险上升与融资收紧的双重压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已多次对非洲债务风险发出警示，这种宏观金融压力直接传导至具体的能源与基建项目。以肯尼亚蒙内铁路为例，作为中肯共建的旗舰项目，其在提升物流效率的同时也伴随着沉重的财务负担。相关数据显示，2000—2024 年肯尼亚

① “Niger’s Junta has Ordered Three Chinese Officials Working in the Oil Sector to Leave the Country,” Reuters, March 14, 2025, <https://www.reuters.com/world/africa/niger-orders-three-chinese-oil-officials-out-country-sources-say-2025-03-14>, accessed September 16, 2025.

对华债务共计约 100 亿美元;^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甚至在 2025 年 3 月因债务高风险暂停对肯尼亚援助审查。^② 这种状况不仅影响存量项目的可持续运营,也在客观上压缩了未来中非能源合作的融资空间,使双方在保增长与控债务之间平衡艰难。

第三,社会层面的本土化诉求与规范性压力日益凸显。社会风险主要表现为内外部的双重挤压。在内部,非洲国家日益强调技术转移与本地就业率,对中资企业的本土化提出要求。尼日尔军政府指控中资企业违反本地化法律,虽有政治操弄成分,但也反映了东道国对创造当地就业岗位的迫切需求。在外部,劳工权益与透明度问题成为西方智库进行规范性设限的工具。例如,美国和平研究所(USIP)2024 年报告指责中国在非洲矿产供应链中忽视环境标准与劳工权益,并缺乏合同透明度。^③ 这种指责往往脱离非洲发展的阶段性现实,本质上是将社会议题政治化,试图削弱中国企业在当地的社会合法性。尽管中国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但这种话语围剿仍增加了中非合作的舆论成本与合规压力。

第四,环境治理能力差异与突发性生态风险。环境风险不仅源于传统能源开发的污染隐患,也源于绿色技术转移中的水土不服。一方面,非洲国家环保法规执行力参差不齐,监管真空地带极易滋生长期生态隐患。另一方面,突发性环境事故的处置能力仍待提升。以 2025 年 6 月赞比亚矿坝泄漏事件为例,中色股份旗下谦比希湿法冶炼公司的尾矿坝溃坝,尽管涉事企业迅速履行修复赔偿义务,但此类事件仍暴露出大型能源矿业项目

① “Chinese Loans to Africa Database,” Boston University Global Development Policy Center, <http://bu.edu/gdp/chinese-loans-to-africa-database>, accessed September 16, 2025.

② “Kenya Feels Financial Squeeze of China’s Standard Gauge Railway Loans,” Africa Defense Forum, October 14, 2025, <https://adf-magazine.com/2025/10/kenya-feels-squeeze-of-chinas-railway-debt-trap/>, accessed December 16, 2025.

③ “Critical Minerals in Africa: Strengthening Security, Supporting Development, and Reducing Conflict amid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 USIP Senior Study Group, April 2024, <https://www.usip.org/sites/default/files/2024-04/critical-minerals-africa-senior-study-group-final-report.pdf>, accessed September 16, 2025.

在极端气候适应性与安保防范上的短板。^① 此外，在清洁能源领域，如何确保绿色技术与当地薄弱的维护体系相契合，避免出现建成即废弃的技术断层，也是环境可持续性面临的深层挑战。

第五，外部地缘政治的围堵与话语遏制。西方国家将中非能源合作视为对其既得利益的挑战，采取舆论抹黑与外交施压的组合拳进行遏制。它们一方面通过“新殖民主义”“债务陷阱论”等叙事，试图在道德高地解构中非合作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实施竞争性能源外交，尤其是美国力图通过控制关键矿产供应链与油气源头阻断中国能源通道。^② 这种将能源问题泛安全化的操作，不仅暴露了西方既要求非洲开放又阻碍其多元化合作的双重标准，也使中非能源合作被迫卷入大国博弈的漩涡，增加项目落地的政治阻力。

（二）应对策略：构建系统性的风险治理体系

面对中非能源合作进入深水区的复杂挑战，单纯的应急式处置已难以适应形势需要。必须超越零敲碎打的战术应对，着眼于长远，构建集机制嵌入、金融创新、价值共享、绿色协同与叙事重塑于一体的系统化风险治理体系。

第一，强化政治风险的多层级治理与空间对冲机制。针对非洲地缘政治的碎片化特征，亟须构建从双边到多边的立体协调网络。除巩固现有的顶层设计外，应实质性强化与非盟、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等区域组织的机制化对接，推动能源战略、技术标准与法律规范的协同制定，将单一国家的政治风险通过区域多边机制进行缓冲。同时，在微观操作层面，建立常态化的政策对话与风险预警系统，实现对项目全生命周期的政治扫描。更重要的是，在战略布局上应推动投资从单点突破向区域集群转型，通过多国联动的产业链布局实现风险空间对冲，避免因单

① 《在非洲遭 800 亿美元天价索赔，中国有色矿业回应》，观察者网，2025 年 9 月 21 日，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1651008，访问日期：2025 年 11 月 1 日。

② 李北陵：《中非能源合作前景广阔》，《中国石化》2011 年第 1 期，第 57—59 页。

一国家政局突变而导致整个供应链断裂。

第二，探索混合融资模式，破解债务可持续性与发展融资需求之间的两难困局。为化解债务可持续性难题，必须创新投融资范式，降低对主权借贷的过度依赖。可积极推广混合融资模式，通过政府资金的杠杆作用，撬动社会资本与商业基金的介入；同时引入世界银行、非洲开发银行等国际多边金融机构参与项目评估与联合融资。这种多元化的融资结构，既能通过引入国际通行的评估标准提升项目决策的专业性与安全性，又能通过风险共担机制减轻非洲国家的直接债务负担，为项目长期运营提供资金保障。

第三，推动社会责任从用工本土化向价值本土化转变。化解社会风险的关键是获取东道国社会广泛认可，即社会经营许可。合作应超越简单的雇佣比例要求，通过制度创新实现人力资本深度转移。以中石油公司在苏丹推行的技术师徒制为蓝本，未来的合作应建立标准化的职业技能认证体系，构建从一线操作工到中高级管理者的完整晋升通道。这种让技术转移与个人职业发展同频共振的模式，能使当地员工从产业链旁观者转变为利益相关者，从而在根源上消解劳资隔阂，提升本土社会的归属感与支持度。

第四，确立全生命周期的环境管理与第三方协同监管范式。环境治理不应局限于事后补救，而应建立贯穿项目规划、建设、运营及退出全过程的绿色标准体系。一方面，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并积极对接国际先进环保标准；另一方面，引入独立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建立可测量、可验证的透明化环境监管系统。通过这种开放的协同监管新范式，既能倒逼企业提升环境绩效，又能有效回击西方关于“环境掠夺”的指责。同时，注重绿色知识转移，为非洲培养本土环保人才，构建起既能支撑经济增长又能通过生态检验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第五，重塑话语叙事，从被动辩解转向主动建构。在国际话语权博弈中，单纯的防御性辩解往往收效甚微，必须转向基于实效的事实叙事与第三方背书。中非能源合作的丰硕成果本身就是最有力的论据，未来的传播

策略应聚焦微观实效，不仅由中方讲，更要鼓励非洲受益国政府、民众及独立的国际智库发声，形成立体化传播体系。通过引入国际权威机构的第三方评估报告，将合作成效置于公认的评价体系下，用客观数据与多元化声音构建具有公信力的中非能源合作新叙事，从而有效对冲西方的污名化遏制。

（三）深化路径：迈向高质量发展

中非能源合作的未来图景不应止步于对风险的被动防御，更应着眼于主动的战略升级。在全球能源转型与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双重驱动下，未来的深化路径应致力于构建技术引领、机制融合与文明共生的三维架构，推动合作从产能输出向高水平共建跃迁。

首先，以技术阶梯式跃迁为核心，引领非洲能源体系的绿色智能化重塑。据国际能源署预测，到 2040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电力需求将增长 3 倍，年均增速达 6%。^① 面对巨大的供给缺口，传统补网模式难以为继，中非合作需依托新一轮能源技术革命，实施三步走的进阶战略：第一步是精准保供，即立足非洲资源禀赋，因地制宜优化分布式光伏与水电布局，解决最紧迫的民生用电与降本增效问题。第二步是智慧赋能，旨在解决电网稳定性难题。通过推进规模化储能技术的本土化生产，构建源网荷储一体化的智能电网系统，将微电网技术与数字管理平台深度融合，帮助非洲实现从用上电到用好电的质变，为其工业化奠定数字化能源底座。第三步是前沿布局，在保障民生的基础上，挖掘非洲的光热资源潜力，联合探索绿氢全产业链合作。结合非洲毗邻欧洲的地缘优势，共建氢能制备、提纯与储运体系，逐步将其打造为面向国际市场的绿氢出口基地，从而在这一前沿领域实现中非能源合作弯道超车。

其次，以绿色金融与多边协同为支撑，构建开放包容的治理生态。面

① 李蒲健：《深化中非电力能源合作，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勘察设计》2019 年第 7 期，第 25—32 页。

对全球气候治理的刚性约束，中非能源合作需在机制设计上寻求广度与深度的双重突破。在广度上，探索“中非+第三方”的开放合作模式，主动融入全球可持续发展框架，积极对接国际多边开发机构或发达国家企业。通过引入第三方技术资金与管理标准，不仅能有效分散巨额投资风险，更能将中非合作嵌入全球价值链，消解地缘政治的排他性阻力。在深度上，挖掘碳资产的金融价值。非洲拥有全球最具潜力的可再生能源与森林碳汇资源，未来的合作应致力于打破单纯的项目融资瓶颈，探索建立中非碳交易连接机制。通过市场化手段将非洲的生态潜能转化为可交易的发展资本，拓宽绿色债券、气候基金等融资渠道，从根本上破解绿色项目的资金难题。

最后，以文明互鉴与知识共享为根基，重塑战略互信的深层逻辑。中非能源合作的长远生命力，植根于超越经济利益的文化认同。面对西方舆论的污名化叙事，中非需构建基于全球文明倡议的全新话语框架。这一转型的关键在于从单向的形象展示转向双向的知识生产与价值共鸣。一方面，通过设立联合实验室、智库交流及青年领袖培训项目，推动技术标准与治理经验的深度分享，让非洲精英阶层成为中非合作的理解者与推动者；另一方面，在具体的能源合作实践中尊重非洲本土文化与生态伦理，以民心相通化解文化冲突。当合作真正回应了非洲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并展现出对多元文明的尊重时，一种可信、可爱、可敬的合作形象便会在国际舆论场中自发生成，从而为中非命运共同体构筑起坚实的民意基础。

结 语

纵观中非能源合作的历史与实践，这是从政治声援走向经济共生，进而迈向绿色高质量发展的进阶之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非能源合作在半个多世纪的时空演进中，彻底重塑了“中心—边缘”的依附型发展模式。从早期坦赞铁路时期的无偿援助，到苏丹石油开发时期的全产业链构

建，再到新时代以肯尼亚、乌干达、埃塞俄比亚为代表的多元化合作实践，中非双方逐步探索出因地制宜、双向赋能的合作范式。这种范式超越了单纯的资源贸易，将基础设施建设、技术标准转移与人力资本培育深度嵌入能源开发全过程，成功实现从输血向造血的结构性转型。特别是随着中非合作论坛机制与“一带一路”倡议纵深推进，双方合作已突破传统化石能源的物理边界，向着光伏、风能、绿氢及智能电网等前沿领域拓展。这种绿色与发展并重的路径选择，既确切回应了非洲大陆工业化对能源可及性的迫切需求，又有效化解了生态脆弱性带来的挑战，不仅为非洲国家构建独立自主的现代能源体系奠定物质基石，也为中国能源安全的保障与产能的全球化布局提供战略支撑。

放眼未来，在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战略定位下，中非能源合作已超越双边范畴，成为“全球南方”国家探索自主现代化道路的时代标杆。当前，面对全球地缘政治博弈加剧、债务风险积聚及西方话语遏制等复杂挑战，中非能源合作展现出强大的内生韧性与制度活力。这种活力源于务实高效、互利共赢的合作基因，即不附带政治条件，始终将提升发展中国家的民生福祉与自主发展能力置于首位。这种以发展实效消解意识形态偏见的实践逻辑，是对西方主导的传统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的建设性修正。展望前路，中非双方必将进一步深化在数字能源、绿色金融及气候治理等高端领域的协同，通过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能源合作新生态，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出中非智慧与方案。

（责任编辑：贺 杨）

The Concept, Model and Contest for Discourse Power in China – Africa Energy Cooperation: Evidence from Kenya, Uganda and Ethiopia

Weng Bingying and Wu Cen

Abstract: Amidst global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s and the pursui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energy has solidified its position as a core domai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Africa, with its considerable resource potential, is increasingly emerging as a strategic focal point for the energy diplomacy of major power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review the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and conceptual changes of China – Africa energy cooperation, focusing on the cases of energy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ree East African countries—Kenya, Uganda and Ethiopia—to extract their diversified practical models. The study reveals that with the continuous maturation of the Forum on China – Africa Cooperation (FOCAC) and the advancem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hina – Africa energy cooperation has progressively moved beyond the early, singular aid – based framework. It is shifting towards a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model centered on using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to drive energy development, integrated whole – industry – chain collaboration in traditional energy sectors, and green innovation in clean energy. This transformation not only embodies the principles of China’s Africa policy – sincerity, real results, amity and good faith, and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ut also promotes the formation of a new cooperation model centered on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equality, and mutual benefit among countries in the global South at the practical level. Despite existing complex external challenges, the future of China – Africa cooperation is poised to advance the transformation of Africa’s energy structure

and its high – tech industrial landscape. This South – South cooperation practice, characterized by green innovation and grounded in mutual trust and mutual learning, not only provides a practical pathway for addressing global climate change and energy security challenges but also offers an innovative and practical example for improving the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 system, which holds significant strategic importance for promoting the building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Keywords: China – Africa energy cooperation, energy diplomacy, global governance, South – South cooperation

Authors: Weng Bingying, Professor of the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60); Wu Cen, Postgraduate Student of the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60).

An Analysis of South Africa ’ s Post – Paris Agreement Climate Change Policy

Gao Xiaosheng

Abstract: South Africa is the largest emitter of greenhouse gases in Africa and one of the emerging economies that are actively participating in 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 issues. South Africa ’ s post – Paris Agreement climate policy decisions are choices made after weighing the pros and cons of 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 and achieving economic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post – Paris Agreement era, South Africa aims to achieve effective responses to the negativ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solve problems i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realiz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ransformation, and enhance its international image through actively participating in 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 issues. Overall,